Globethics Repository



誰的北京？怎樣一個基督教？——評高師寧《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A Book Review on Gao Shining’s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s in Beijing Today]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HU, Jeremiah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4 11:14:4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184

誰的北京？怎樣一個基督教？

——讀高師寧《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

祝帥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二〇〇三年，一本名為《耶穌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變中國及全球力量平衡》（*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的書，在美國社會中引起巨大的反響。作者艾克曼（David Aikman）曾長期在華工作，是美國《時代周刊》（*Time*）資深記者，也是曾經一時洛陽紙貴的《信心之人：布殊總統的信仰歷程》（*A Man of Faith: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George W. Bush*）*一書的作者。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艾克曼根據自己長期在北京工作的經歷描述了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及其前景預測。作者看到，在北京，每個星期天的教堂中都擠滿了做禮拜的信徒，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無法統計的家庭聚會，並且知識分子階層以及政府官員中間也有愈來愈多的人接受了福音。據作者估計，目前中國基督徒（包括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數量甚至已經超過共產黨員，照此規模發展，伴隨着北京籌辦二〇〇八年奧運會的契機，中國有可能在未來三十年內成為基督教國家（即百分之三十以上人口成為基督

* 中譯本：艾克敏（又譯艾克曼）著，姚敏、王青山譯，《布什總統的信仰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布殊又譯布什。——編注

徒，基督教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從而能夠為基督教在伊斯蘭國家的傳播，乃至世界和平與民主貢獻重要的力量。

且不說艾克曼的預言是否過於樂觀，他對於北京基督教發展現狀的描述和分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描述對象的整體，恐怕也是缺乏經驗與實證研究的支持的。究其本質而言，我的這一判斷與所謂「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偏見與誤解」無關，而是基於新聞記者的工作性質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嚴格區別。一般地說，新聞記者的工作性質要求發現社會話題的新聞價值，儘管力圖避免「價值判斷」，但這種工作性質幾乎無法徹底迴避對於讀者口味的迎合；而社會學者則重在把社會事實、一手文獻中立地呈現出來，力圖實事求是地展現研究對象的真實面貌。因此相比較而言，如果希望了解北京基督教與基督徒的真實信仰生活，宗教社會學學者高師寧的《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宗教社會學個案研究》（香港：道風書社，2005）一書，無疑要比艾克曼的著作更具參考價值。

一、從人文思入社會

一如楊鳳崗先生在為《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所寫的序中指出的那樣，「宗教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首先是由人文學者開拓興起的」（見該書頁 21）。並且相當一部分人文學者屬於「半路出家」，從文藝學、哲學、思想史等領域轉入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問題的研究，因而往往缺乏宗教研究方法方面的嚴格訓練，「宗教社會學」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領域。檢索中國二〇〇一年以前出版的「宗教社會學」類書籍，大部分屬於教科書性質或者僅僅是宗教社會學理論流派的介紹，而這種對於理論流派的興趣仍然帶有強烈的人文學科思想史研究的色

彩。只有近年來才出現一些應用人類學、社會學方法進行實地研究的著作，如吳飛《麥芒上的聖言——一個鄉村天主教群體中的信仰和生活》（香港：道風書社，2001）、李峰《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秩——華南Y縣X鎮基督教教會組織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等等。而其中，高師寧的著作尤其引人注目。這不僅僅是因為基督教在北京的發展是一個很多人關注的社會現象；更是因為作為一位長期從事人文背景的基督教與宗教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學者，高師寧女士本人發生如此重要的「學術轉型」一定有其獨特的思考與深層原因。

在開篇的「導言」中，作者交待了該研究課題的緣起、研究方法以及自己「走出書齋」，進入信徒群體展開宗教學研究的若干動因。作者敏銳地看到了「宗教學研究包括神學的、人文的和社會科學的這三大進路」（頁41-42）。相對而言，在中國內地的宗教研究中，神學進路的研究多由教會體制下的神學院校來負擔，人文進路的研究則多見於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唯有社會科學進路的宗教研究處於二者的邊緣，至今幾乎仍是一塊有待開墾的處女地。這其中固然有對於西方宗教社會學學科發展不了解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宗教學」與「社會學」兩種不同背景的學者之間缺乏互動與溝通。換言之，很可能只有人文方面學術背景的宗教學者對於操作性極強的「社會研究方法」充滿陌生乃至偏見；而社會學背景的學者可能對「宗教學」這一領域幾乎一無所知，這一點在中國內地的學者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作者巧妙地通過對於已有宗教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借鑒，以及西方社會學者對於宗教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歸納，使得自己在進入實證研究的時候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作者歸納概括了「跨文化的比較分析法」、「歷史分析法」、「調查研究與統計分析法」、「控制實驗法」、「參與觀察法」、「內容分析法」六種不同於一般社會研究方法的宗教社會學獨特的研究方法，但事實上在正文的研究報告中，作者並未刻意突出研究方法的前設性及其重要地位，而是把重點轉向了對於事實的描述與分析。具體而言，這裏所列出的六種研究方法中，除了「控制實驗法」和「內容分析法」兩種側重於定量研究的方法沒有得到體現以外，其餘幾種研究方法在正文中往往是交替使用的，而其中尤以「參與觀察法」（或稱「田野調查」）以及定性的實地研究（深度訪談）兩種方法比重最大。也許可以說，由於作者意識到「宗教社會學」研究的複雜性，使得最終的研究報告是在「以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相配合」的背景下展開描述的。

究其原因，作為一種描述性的研究，由於旨在向公眾呈現當代北京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整體面貌，採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可能最為恰當，在本研究需要大量助手（可以想象其中大部分並沒有經過嚴格的社會學訓練）配合的情況下，也是最容易展開執行的——除了研究所需要的大量人力、財力之外，幾乎不存在任何掌握研究方法方面的操作障礙。正如楊鳳崗先生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宗教社會學的某些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比如科學抽樣、問卷調查、統計模型等，這些需要花很多時間系統學習。但另外一些社會學方法並不難學習，比如參與性觀察和深度訪談」（頁 21）。事實上，不但不應該以這些定量研究方法來要求、束縛宗教社會學領域的學者，甚至應該看到，「重定性、輕定量」這種做法在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都有所體現。由於人類學的影響，中國社會學長期以來都有一種

忽視經驗、實證研究的傾向，比較注重定性研究，而相對而言忽視定量分析，[1]這種現象與國外的社會學發展恰恰相反，甚至在一些學科裏面產生了把非定量的研究方法統統稱為「定性研究方法」的誤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社會學之科學性的一個重要體現，儘管相對而言許多學者對「定量研究」比較陌生，但「非定量研究方法不一定就等於定性研究方法」。[2]對此，作為宗教社會學領域一部具有先驅性的研究報告，《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已經在力所能及的層面上建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或許正是出於這種原因，作者的《導言》與一般社會學研究報告相比也有很大不同。首先是沒有明確的「假設」，換言之，這種沒有問題預設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呈現」和「描述」一個本真的生存狀態，而不是試圖印證或者檢驗某種理論。其次，與其他注重定性研究的報告不同，本書導言部分包含了一個幾乎囊括整個中國宗教社會學學術史的文獻綜述，以及作者自己對於這門學科的問題與反思。這使得本書從一開始就帶有了濃厚的人文色彩，而在典型的定性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是盡力避免「文獻綜述」有可能帶來的影響。然而，這也未嘗不能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事實上這裏的研究綜述不但並未對正文的研究形成過多的干擾，相反，作者的一些操作化處理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用宗教社會學的獨特性豐富了人們對於社會研究方法的理解。

二、以缸瓦市教堂為中心的描述

在「導言」結束之後，作者進一步使用一章的篇幅介

1. 參見馬戎，〈前言〉，載謝宇著，《社會學方法與定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5。
2. 陳剛，〈自覺與反思：對中國廣告學研究方法的分析與思考〉，載程曼麗主編，《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第二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14。

紹「北京的基督教概況」。應該說，這一部分對於歷史和現狀的描述，主要並非基於此次社會調查的研究成果，而仍是一種人文式的概述。對於對北京基督教情況比較陌生的讀者來說，這一部分介紹仍然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在於這一部分結尾處提出了「建制教會」和「聚會點」兩種不同形式的基督徒聚會方式，進而指向了此次調查的核心地點——北京基督教會缸瓦市堂。

「建制教會」（「三自教會」）和「聚會點」（「家庭教會」）作為兩種不同形態的教會，在當下中國的確是並存發展的。但是以是否反對中國官方的基督教「兩會」（即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基督教協會的統稱）遵循的「自傳、自製、自養」的「三自政策」來劃分這兩類聚會卻並不恰當。這是因為有很多聚會點（其實有很多聚會點並不在家庭中，所以「家庭教會」的提法並不具有代表性，但這裏採用約定俗成的稱謂）並不反對「三自」政策，相反卻按照政府的要求在「三自教會」進行了登記，並由「三自教會」派出牧師或傳道人進行定期的牧養（三自教會的教牧同工對此往往稱之為「下聚會點」）。也有一些聚會點出於種種原因不願意在「三自」組織登記，當然其中一部分公開表示出對於「三自」原則的抵觸，而這一類的聚會點才真正具有「邊緣」的性質。[3]可見，就北京而言，「建制教會」和上述「邊緣教會」並存的局面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只有充分考查這兩種教會的信徒宗教生活才能得出一般性的結論。出於這層原因，《當代北京的基

3. 我們無法判斷這一類教會的實際數量，但至少是客觀存在的。經筆者多次與國家宗教局、北京市宗教局和各區縣民族宗教事務管理辦公室（「民宗辦」）的官員接觸和交流得知，目前國家對於這一類「邊緣」教會也並沒有嚴格的法律禁止。在北京的情況往往是，儘管與《宗教管理條例》的精神不符，但對於多數在家庭中聚會的基督徒，只要不構成「擾民」，政府一般不會加以治安干涉。

督教與基督徒》選擇了北京基督教會缸瓦市堂和一處設在外企內的聚會點進行個案研究是對此有所顧及的。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教會體制之外、甚至有可能並不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學者對於「家庭教會」的接觸相比較對於「建制教會」的了解和把握要困難得多，除非碰到可靠的「線人」，學者對於中國家庭教會的調查一般來講都不容易成功，更遑論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形形色色、組織各異的「家庭教會」本身也是很難做到的事情，事實上《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選擇的「S基督教聚會點」是否在北京的「家庭教會」中具有代表性也不得而知。因此，《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中絕大篇幅的調查和訪談是在北京基督教會缸瓦市堂進行的。在該書研究項目進行之時（二〇〇三年前後），北京城區內共有像缸瓦市堂這樣官方建制的教會五所，二〇〇五及二〇〇六年又分別增加了朝陽、豐台兩所。儘管這些教堂彼此之間的信徒構成、聚會習慣、敬拜風格等等都有所不同（如寬街教堂不允許女性講道、海澱教堂信徒整體素質比較高、缸瓦市教堂主日、安息日、朝語的「三聚會」等等，這一點《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中已經有所涉及），但相對而言，這樣的教堂都是開放的、信徒出入自由，因而也是展開學術研究的理想場所。

事實上，中國教會體制之外的學者大部分研究著作及其對於「中國基督教」的理解，也是建立在這種建制教會中的基督徒群體之上的，《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自然也不例外。作者從中選擇缸瓦市教堂從事個案研究，可能與缸瓦市基督教堂位於北京西城中心的西單地區，人流量比較大，並且曾經多次接待過布殊、賴斯（Condoleezza Rice）等重要國外元首的訪問有一定的關係。不論如何，在這裏作者實際上假定了在北京各個教會中聚會的基督徒

之間並不具有明顯的差別，因而對於在缸瓦市教堂從事「參與觀察」所得出的一些結論，作者往往推而廣之用以描述整個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但為了起到一種平衡和補充的作用，作者在進行「問卷調查」的時候，也顧及到了其餘的幾個教堂。

作者對缸瓦市教堂的主日聚會為期兩個月的參與觀察，得出了一些非常真實、可信的一手觀察資料，是教外人士了解該堂聚會狀況的絕佳素材。「附錄」中所附的「參與觀察報告（原始記錄）」的記載就非常完整、豐富。當然，由於作者對於基督教信仰的隔閡以及一些基本教義的陌生，還是出現一些無意的偏差：如誤稱證道經文的讀法是「由主禮人讀證道經文單數節，會眾讀雙數節」，把「證道經文」混同於「啓應經文」；稱「宣召」為「主禮人誦讀一段詩篇」；稱教會禮儀「擘餅」為「掰餅」等等（頁91）。但這些無意的誤解，不但並沒有損害原始記錄的可靠性，相反更加提供了一種真實的現場感。

三、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作者採用了定性、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進行了一些定量的統計分析。但相對而言作者的抽樣方式卻存在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對此作者本人也並非沒有覺察：「我所採用的是『偶遇抽樣』與『雪球抽樣』法，這便是那些最先被碰到的、最方便碰到的、最容易碰到的對象比其他對象有大得多的機會被抽中，因此，就不可能保證北京城的每一個基督徒都有同等的被抽中的概率。因此，從社會學的方法而論，這種方法的代表性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說，如果用我的調查結果與分析結果來推論總體城市基督徒，那

麼它是有限的」（頁 61）。儘管這裏的坦陳值得讚許，但畢竟冠以「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作為書名，那麼還是應該來正面處理一下這個問題。的確如作者所說，這種非概率的抽樣容易造成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抽樣誤差，比如可能根據某些人的穿着、形象、舉止等判斷「此人不易接近」而放棄其作為樣本的可能性，從而大大降低了抽樣結果的置信水平。按照《社會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作者巴比（Earl Babbie）的描述：「〔隨意抽樣〕這種方法經常為一些未經訓練的研究者採用，但這種方式存在着嚴重的問題，……意味着這些被挑選出來的樣本並不典型或者對總體沒有代表性。」[4]

此外，作者採用的深度訪談由於屬於一種定性研究的方法，而定性研究很少採用概率抽樣的方式來進行，因而在社會研究方法中一般並不具有統計學上的含義。有鑒於此，不能說《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一書能夠依據這種抽樣方法順利成章地得出整個北京基督教與基督徒的全貌。事實上，作者本有一些技術可以用來迴避這一問題，比如通過作者長期觀察與教會的牧師或其他負責人建立的良好關係（頁 62），完全有可能索要一些有關信徒總體的名單（例如該教會幾年內的受洗信徒情況登記表）從而確立抽樣框，並根據隨機數表或利用計算機進行嚴格的概率抽樣（這裏姑且擱置研究倫理方面的討論）。否則，無論在正文中進行了多麼嚴格的數據分析與統計，都無法基於用這種抽樣方法得出的樣本（無論這些樣本是否有效）從整體上作出通則式的描述。無論如何，作為一本宗教社會學個案研究的專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4. 巴比著，丘澤奇譯，《社會研究方法（第十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頁 181-182。

相比較而言，作者的社會學功力更多地體現在對於核心概念的操作化處理上，這突出地體現在第二至五諸章——「個體信仰的確立」、「個體宗教性之方方面面」、「宗教信仰對於個體的影響」和「世俗生活中的基督徒」——當中。在對「宗教性」、「宗教虔誠度」等等通過人文方式表述的核心概念進行操作化處理的過程中，作者長期以來積累的宗教社會學理論功底得以彰顯，使得她有機會根據中國信徒的具體情況對已有的理論和操作維度或量表等作出應用、修改或者修正。因此在這四章的專題研究報告裏面，作者所採取的一般形式是：提出並修正理論－深度訪談個案－問卷數據量化分析－小結。這樣做使得「概念化」的過程變得相對簡單和易於操作，同時立足於前人的基礎上盡可能地避免了「操作化」過程中的變量遺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以有的理論很有可能為研究帶來「先入為主」的導向，在《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中，作者是通過大量翔實、可信的一手深度訪談原始資料來謹慎地避免了這一問題。並且，作者看到「在問卷不可能深入了解信徒的內心世界的地方，深入訪談正好可以彌補這些不足」（頁 148）。只是作者在研究報告中往往把深度訪談的個案置於問卷之前，似乎更像是利用深度訪談獲取問卷設計的指標。

以第三章「個體宗教性之方方面面」為例，作者在西方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把「宗教虔誠度」概念操作化為「信心的發展」、「對教會的態度及對教會活動的參與」、「對《聖經》的認識和閱讀」、「祈禱」、「對傳教的態度」五個維度，具有較為全面的概括性。但作者對每一個維度或變量的闡釋，往往都始於定性的個案研究，隨後以問卷的統計作為印證或支持（如頁 157-164），這是不符合社會

科學研究方法的一般規則的。一般來說，深度訪談可以作為問卷的延伸或者豐富而不是相反，否則不利於突出深度訪談的特殊價值。

事實上，由於受到所謂「霍桑效應」（即研究者的存在對研究對象形成干擾）的影響，無論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都不太可能完全反映社會研究對象絕對的真實狀態。以書中第五章「世俗生活中的基督徒」所涉及的「基督徒的身份認同」這個極為重要、也極富研究興味的宗教社會學課題為例，作者發放問卷（仍是通過非概率抽樣）得出的結論是：83.1%的人宣稱自己願意公開地在社會上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13.6%的人對此表示無所謂；而只有3.3%的人不願意公開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頁 243）。然而，這個數字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樣本的真實性卻是極為可疑的。根據筆者個人的交往經驗，可以感覺到目前北京有相當一部分基督徒不願意在學校、單位等場合公開承認自己的信徒身份，並且這個數字很有可能超過這裏所說的3.3%；但是在教堂發放、填寫問卷的過程中，人們又完全有可能顧忌到《聖經》上「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太 10:33）的教訓，或考慮到在研究者面前確立基督徒群體的認同而作出言行不一致的回答。在此時，恰恰需要作者通過深度的定性訪談對受訪者（特別是明確表示不願公開身份的基督徒）進行深入的探究，但很遺憾作者恰恰在這裏缺乏幾個必要的個案支持。

四、結語

顯然，《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並不願意僅僅停留在對於北京基督教與基督徒現象的描述，而是希望通過經驗的實證研究歸納出一些理論（頁 279），在某種程度

上，這也反映出作者濃重的人文情結。有了一手調查的結果為素材，作者在對「宗教的定義」、「人的宗教性」、「信仰與道德的關係」等問題的討論上可謂別具匠心；而建立在參與觀察的基礎上對「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兩種不同的教會類型以及教會的社會地位等問題的觀察與思考，也是教會體制內的教牧同工與信徒參考的重要資源。

儘管作者作為更偏重於人文訓練的學者，在運用社會研究方法（特別是定量研究）的時候有着一些有意無意的隔閡，但這種勇於自我突破的嘗試是真誠而難能可貴的。更為重要的是，作者長時間的參與觀察使得她有資格對北京教會及其信徒的信仰狀況進行描述，並從中引出一些學者式的獨特思考。可以說，高師寧女士的研究，為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從一門理論學科走向應用學科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既不同於此前的吳飛對於鄉村天主教的人類學式田野調查，也不同於李鋒對於一個鄉村教會的組織社會學式分析，而是同時兼備了兩著可貴的學術品質和研究視野。無論如何，在高師寧筆下的北京和基督教既是客觀的，也是真誠的，她在向我們展示這樣一個真實的北京和基督教的同時，也提示着我們中國宗教學研究中一種新的方向，而這種方向呼籲宗教學者和社會學者的通力合作。

作者電郵地址：zspku@yahoo.com.cn

A Book Review on Gao Shining's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s in Beijing Today*

Jeremiah Chu
Ph.D. Student in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s in Beijing Today – A Case Study on Sociology of Religion by Professor Gao Shining is a positive practice in religion phenomenon study after the author's theory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religion for many years.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in Gang Washi Church of Beijing Protestant Committee (throug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research methods), the author provided us a full and vivid image of Christians and Christianity in Beijing. However, because of the gap between theories of religion and social research method, this book is only a preliminary study. To continually pursue the study of religious phenomenon in the future, we ne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lars from the two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s.